

Z104

涇陽文史資料



1988 4

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
陕西省泾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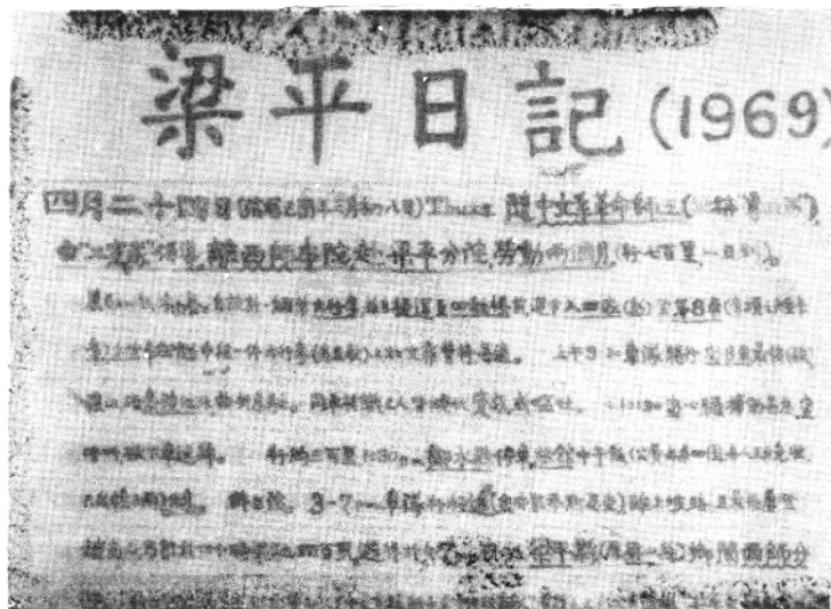
高季维先生遗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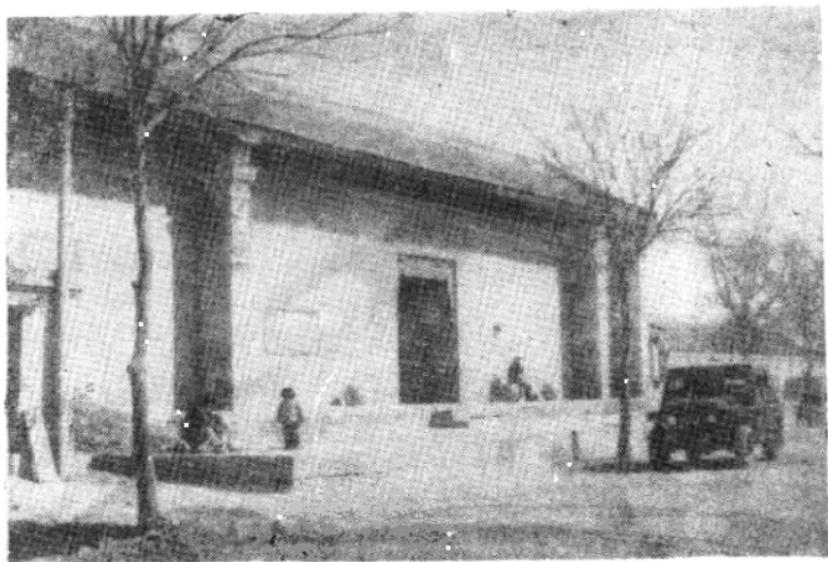
吴宓先生像(1930年摄)



吴宓与周锡光1973年合影



吴宓手迹



安吴青训班遗址



迎祥宮(安吳青訓班學員集會地)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
| 高季维先生传略 | 高又明 | 1 |
| 追记吳宓教授 | 周錫光 | 7 |
| 红学大师吳宓轶事 | 馬富明 | 39 |
| 田伯荫释放被押的共产党人 | 楊永茂 | 48 |
| 田伯荫砍烟苗 | 趙仲玉回忆 王興林整理 | 53 |
| 安吳青训班始末 | 李文恭整理 | 57 |
| 朱总司令在安吳堡 | 第伍旭整理 | 73 |
| 謝秉彥欢迎红军 | 孙文艺 | 76 |
| 刘振支先生的办学思想 | 劉羽升 | 80 |
| 联语一束 | 馬述章 | 86 |
| 王徵 | 徐志禎整理 | 88 |
| 唐代泾阳“养疾院” | 屈松泉 強秀奎 | 96 |
| 孙蔚如赴渝述职 | 孙文艺 | 100 |
| 旧社会泾阳县城的粮食集 | 于一整理 | 103 |
| 解放前泾阳的书店业 | 王興林 | 111 |
| 县训所的驱陈斗争 | 李文恭 | 119 |
| 肉杏 | 劉孝廉 | 124 |

高季维先生传略

高又明

先生讳铭新、字季维，泾阳县王桥镇人也。赋性聪颖，有豪侠气，善墨文，幼业受于柏厚甫先生之门，为高才生。十八年入县庠，复执贽入县宿儒杨风轩惠门下，精研经史及时务，力求实践，不尚高谈。时值清末，外侮日深，内政腐败，忧国之士多徘徊莫知所适，先生乃决隐于商，入川，值铁路国有运动，益有所感，遂决走各地，乃约友，由川经鄂浙至苏，应李季直约，莅沪，办克复杂志，年余，以鼓吹维新为主，嗣经王麟编旦咤吻二君介绍，入同盟会，谭人凤先生一见倾异，语人曰：“高季维终非池中物。”时办杂志，困阻百生，每以不遂所欲为憾。常抑郁也。辛亥武昌首义，先生任交通，致力极多。入冬，上海各界，捐购大量西药器材运陕，于省城设立红十字会，于东西各县设分会，医治伤兵，全活甚众，时陕战方殷，急需医药，先生奔

高又明：(1886—1951)：泾阳人，1905年加入同盟会，为陕西近代名人之一。此文撰于一九四四年。

走呼吁尽力多矣！迨清帝逊位，战事结束，先生竟以尽瘁国事致病，辞红十字会职务，臥榻者将及一年，愈后复致力教育，纠同志柏惠民王玉书诸人，合资开设新民图书馆，专以输入文化书报，以开民智。民三年，总理授命宋相辰由日返陕改组陕西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，宋到陕后，招各同志，于西安设立乐羣学社以总揆全省党务。时袁氏窃国跡著，而陕陆军政权，亦操之袁氏所部，吾党人为积极布置各县工作，谋荐先生任泾阳警察局局长，以有实力也，先生慨允。不辞汤火，时乾礼一带，由王绍文等同志负责。事泄，王同志等十三人被袁氏爪牙陆建章惨杀，先生知泾阳亦在络织之中，一面安置善后，一面即向省政府辞职，讵祸不旋踵，而陆之差官武骑至矣！未经县府，即往捕先生，先生知不免，慨然谓来者曰：“余自恃无重大事，且余家室本县，督军捕我或因别人牵累耳，诸君既到，请先饮食，然后同往。”遂款待之，藉机以入厕为请，乃越墙以逸，捕者穷踪不获，乃闭四城门，沿戶检搜，竟二日夜，终未获。先生甫逸出，藏同志周伯敏家，嗣以情势严重，冒险出，匿文庙房顶瓦沟

中，三日二夜，滴水粒米，未尝入口，后虽城开，而侦骑仍四布，无计脱险，乃由同志某密走商县长蒙公养正，蒙同志淳化人也，约以夜，巡卫查城，偕先生至城上隙处，继而出之。此乃民四年春天事也，先生时以不能匿迹泾阳附近，乃毅然走白水郃阳协助同志集马静高静旺诸人，继续进行革命工作。居三月余，复偕数同志，走靖边等地，说卢占魁以革命主义，卢之依附靖国军，颇有战绩，先生与有力焉，惟自先生逸后，陆建章知陕党人潜力极大，时虑覆巢，遂亟捕党人，或以官，或惑以金钱，此技均未能售，竟愤而搜索株连，在陕同志，知陆氏不除，终为西北革命障碍，遂发动渭北各县绅及商会民众等，忠告陆氏，毋以数人之嫌疑，致人怀不安，全境恐怖，陆惧众怒难犯，稍寝其行，但其阴谋仍不稍懈，遂令其子陆少文亲带劲旅四千余人，驻富平县镇慑不成，冀图制止吾党在各县活动，但吾人迄未稍懈，且旋经胡景翼笠僧等率兵一连偕同诸同志擒陆子少文，并缴其驻军全部枪械，从此，陆氏在陕之政治军权消逝矣！西北一带脱离袁氏压迫此乃一大关键也。呜呼！国家不幸，祸乱频来，

袁氏虽去，而北洋军阀继窥国柄。陕靖国军又不得不起，以奠国基，此民六年也。陈树藩继为陕西督军，在陕同志树靖国旗于渭北，先生斯时已由靖边归来，旋由副司令胡公曹公聘任参谋，兼工程营营长，先生谓同志云，总部人才济济，余居之何益，乃选长于技能青年，编队率之战场，利用地形及火药器材，埋伏地雷，架设桥梁，战地所在，获其设计之迹，因以陷敌者多矣！盖先生识胆机警过人，参加靖国之役者，迄今皆能详言之。于公右任回陕任总司令，编全军为六路，卢占魁即为第六路司令，驻防耀县同官一带，卢初南来，部队不谙地方情形，于公虑之，即命同志多人前往，先生与焉。居数月，卢兄某与先生因议事不协，先生知留无益，即仍归总部。时陈氏树藩以与靖国军开战以来，将及数年，兵败，自忖难存，乃由豫引入赵倜军，向北政府引张西垣军，驻渭河南岸，列阵咸阳、渭南各地，决心与吾军一决雌雄，战事紧张已极，时乾县驻军第七支队王珏以乾礼为三原屏障，陈氏大兵来攻，恐措置未善，请总部特派干员到乾主持，于公即命先生为乾县县长，付予以守卫地

方与督导军队之全权，先生受命，星夜赴防，盖陈氏意图利用外兵由两翼夹攻东之固市栎阳，西之礼泉乾县，双方并进，必可获胜，倘三原救两翼，即出奇兵由正面直攻靖国军之根据地，是以敌两翼攻兵倍于吾之守军四倍以上，陈氏并亲督援兵及所有之部，分五路，横贯渭河，同时挺进，先生一面在乾筹筑工事，一面督支队司令王珏坚壁抗战，苦支四十余日，战事最激烈而日夜炮火不息者十六日，虽南面城墙为墟，死伤枕藉，而敌兵仍未敢越雷池一步，陈氏终未得逞，反遭惨败，陈知无能为，乃潜归西安，从此已决定军阀不能立足西北之命运，此其一大关键也，此役战后，我总司令于公巡视各县，并调防队伍，从事休息，藉资补充，特令第七支队王珏调驻富平县之美原镇，先生亦卸乾县县长职，回总部参谋，此民七年事也，总司令部参谋长彭仲翔，秘书长张翔初与先生为最契，每事相济，共同尽职，于公甚得力焉，于民八年四月间，先生衔命赴富平县美原镇往见王珏，车行中途，被来历不明者枪击负伤殒命，临终谓其从者曰：“余生平无私仇，击吾者乃公敌也，可转告吾同志为国努力，

余死无余憾矣。”乃捶胸高啸而歿，伤哉！先生死之年仅三十有三岁，若天假以年，必有更伟大之建树。众同志中凡知者，莫不为吾党惜，莫不为先生悲也，战事结束，伤亡者众，即力所及仍不免疮夷满目也，先生遗体入棺，厝于故里白公渠岸之旁，子一名鸿，今已毕业中央大学，高才生，家无余资，鸿之有成，其弟兰亭抚养之力也，仁者有后，信不虚也。



追记吴宓教授

周锡光

一

历史上往往有一些卓有贡献的思想家、文学家、科学家、著名学者，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，他们长时期被歪曲、误解，甚至其明显的功劳、贡献、成绩也“因其一点不足而攻击其余”统统被抹煞、或者为并不知情者长期“争论不休”，这是又一种“历史的悲剧”。这种不公正，后人尽管可用简单一句话“这是历史的误会”去解说，或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评说，但是，无论怎样，这些历史人物他们毕竟对人民作出了有益贡献，终将会重新被人们所认识和作出公正的评价。吴宓教授即属于这样的“有争论”的历史人物。

说来令人难以置信，同一个人死后追悼会开了两次！吴先生生前在重庆西师惨遭残酷迫害，

周锡光：四川成都巴蜀书社文学编室编辑，系吴宓的学生

而逝世后重庆西师却“专门”为他召开过两次平反昭雪的大会。

第一次：在西师中文系一间小房内举行，事前未作通知，只有中文系部分教工参加。众人感到吃惊，怎么政治理学习中突地挂出吴先生的像来？参加政治理学习的人本来不多，这一下便又溜走不少——敬仰吴先生者，余悸尚存，怕又被说成“划不清界限”，不敢参加；曾积极批斗吴先生者，感到“不可理解”，不愿参加。于是会开得太不象话，一切草草而了，自然更不会广为社会所知了。这一情况反映出，当时的极左思潮影响在西师是多么深，同时这件事也激起了强烈不满和议论，因为这种举措，实在与那时的“科学的春天”、全国知识分子开始“扬眉吐气”、知识界一片生气勃勃景象的气氛，格格不入。

第二次：一九七八年冬，我国外国文学学会（全国性学术组织）在广州召开成立大会，与会知名老专家、老学者竟多是吴先生的朋友和学生，当谈及吴先生的贡献、晚年遭到的残酷迫害而至今尚未正式平反时，众人纷纷愤愤不平，会间便向中央统战部和中国社科院拟写、继而递交了联

名呼吁信，要求为吳先生平反昭雪！自然这引起了中央的相当注意和重视，于是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八日上午，为吳先生平反昭雪的追悼会第二次在西师隆重举行，校党委严肃宣布为吳宓教授彻底平反昭雪！其中提到：

“吳宓先生是西南师范学院教授、院务委员会委员、四川省政协委员，在文化大革命中，因受林彪、‘四人帮’的残酷迫害，于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七日含冤逝世，终年八十四岁”。

“吳宓教授通晓世界多种语文，博览羣书，知识丰富，治学严谨，工作认真，襟怀坦白，直抒己见；在从事文化教育四十多年的工作中，对学生循循善诱，为我国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和教授，以及中、外语文教育人才……是我国研究《红楼梦》并向外国作介绍有较大影响的学者之一。”“文化大革命中，……把吳宓教授打成‘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’、‘现行反革命分子’，纯属冤案，应予平反昭雪，……一切诬蔑不实之词，应统统推倒，吳宓教授的政治名誉，应予恢复。”（见1979年7月20日重庆日报）

虽不免粗疏简略，但已是难得的进步。

后来，我们从报刊偶尔(很少)能读到有只言片语提及吳先生的文字(如83年8月3日《人民日报》载胡乔木《〈杨刚文集〉序》中，提到吳宓教授曾经专门为杨刚翻译的《骄傲与偏见》作序；《书林》81年12期《追忆人民教育家傅任敢先生》一文提及吳宓教授曾对傅深加赞许)，等等，但如是而已，至今尚未见有较详尽准确介绍吳宓教授的专门文章，不能不令人遗憾！金克水先生遂发出“吳雨僧(密)先生，是一位新旧文化交替中的特殊人物，却还未见有文章谈他。”的慨叹(见《学林》84年第九期《记曾星笠(运乾)先生》)！

我有幸，是吳先生晚年最后在课堂执教时期的学生，六零年曾亲聆其讲授“古典文学作品阅读指导”课；我更有幸，七十年代有几个寒暑假曾伴同这位劫后余生的老人一道生活，在他身边朝夕相处，一坐春风，聆受教诲，听他讲授诸多知识，得知了许多珍贵的轶闻遗事并获益良多。因此，我有责任把所知的吳宓教授向读者作一简括介绍。

吳宓先生，作为知识渊博、学贯中西的知名